

儿童是“永恒的弥赛亚”

——伊丽莎白·皮博迪教育思想简析

杨靖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伊丽莎白·皮博迪是美国19世纪教育家。在漫长的一生中，她一方面坚持阅读写作，提高个人学识素养，进行自我教化(self-culture)或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又积极投身到包括超验主义、废奴和反战运动，以及争取妇女权益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将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是她毕生关注的问题。1860年，她在波士顿创办全美第一所英语幼儿园，使得幼儿教育走上正规化发展的道路，而她本人也作为美国学前教育的先驱被载入史册。

【关键词】皮博迪 自我教育 儿童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8-0167-04

伊丽莎白·皮博迪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比勒瑞卡。父亲行医，母亲是女子学校的教师。她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仅限于在母亲学校旁听的内容，其他全靠自学。皮博迪夫人耐心细致，在教学活动采用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思维，培养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皮博迪和她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索菲亚日后在她们自己开办的学校中都继承了母亲的这一风格。

皮博迪自幼酷爱学习，文学、历史、拉丁文各门功课都很出色。13岁开始研读《圣经》，在聆听了唯一神教牧师钱宁博士的布道后，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立志过一种基督教徒完满道德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享受这种道德生活。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在她看来，唯有教育。

1822年，皮博迪正式成为一名教师。她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精妙见解吸引了钱宁博士的注意。他不仅将自己的女儿送到皮博迪姐妹开办的学校，而且破例允许她自由使用他的私人图书馆。钱宁关于“人神相似论”的观点对皮博迪影响很大，同时她关于宗教仪式应该革除，代之以人与上帝直接交流沟通的观点也得到钱宁的赞同。她自告奋勇担当了钱宁的助手，帮助他抄写布道文、整理文稿。作为崭露头角的女学者，她的声誉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学生。

教学之余，皮博迪意识到希腊文对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开始自学。而她延请的入门教师则是刚从哈佛学院毕业的爱默生。这次会面，男女青年都很拘谨。“双方都没敢抬头互看一眼”^{[1]P216}，时间也很短暂，但却为双方长达60年

的交往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教育，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教育，连同其他社会改造计划，成了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克雷明在《爱默生论教育》一书中曾客观地指出，爱默生自1830年代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持久而浓厚的兴趣，多半受到身边从事教育的朋友的影响^{[2]P38}。这些朋友包括皮博迪、玛格丽特·富勒，还有A.布朗森·阿尔科特。

阿尔科特出身于农民家庭，只受过很少的学校教育。后来通过自学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1834年，他举家搬迁至波士顿，打算按照自己的新型教育理念，创办一所学校。皮博迪在报上读到阿尔科特的文章，大为叹服，主动与他会面。发现“他在教育方面的天才远过于自己”^[3]，于是决定将自己召集的十多名学生编入阿尔科特“神庙学校”。她本人则担任助手，同时兼任拉丁、算术、地理三门课的教学工作。阿尔科特通过苏格拉底问答法组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思维，这对于当时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大胆革新。皮博迪将师生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校志》并于1835年出版。

《校志》的出版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阿尔科特成了名闻遐迩的教育家。甚至有英国人远渡重洋前来参观他的学校。一年以后，他打算推出另一部反映他教学成果的作品《与儿童谈福音书》，邀请皮博迪担任编辑整理工作。由于讨论内容牵涉到性与生育等当时社会禁忌性话题，皮博迪建议他删除，却遭到拒绝。由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声誉受到影响，她提出了辞呈。助手一职由富勒接替。

* 作者简介：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历史与文明。

不出皮博迪所料,该书出版后受到教会内外保守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哈佛神学院教授安德鲁·诺顿宣称该书“三分之一是荒谬,三分之一是亵渎,三分之一是淫秽”^[4],等于直接宣判了它的死刑。家长们纷纷撤出自己的孩子,“神庙学校”宣告倒闭,阿尔科特被迫拍卖藏书清偿债务。他后来接受爱默生资助,避居康科德乡下。

1837年,作为波士顿文化圈杰出女性的代表,皮博迪与富勒一道参加了以爱默生、赫奇、李普利牧师等人为首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超验主义哲学秉承德国唯心主义的遗绪,强调精神的力量远过于物质力量,个人法则可以凌驾于社会法则之上。为了普及和宣传他们的思想,超验主义者决定创办一份杂志《日晷》,编辑由富勒和爱默生先后担任,皮博迪则负责出版。作为雄心勃勃的出版家,她不仅出版发行了钱宁博士的布道文和她自己的一些翻译文章(如法国哲学家吉兰多的“论自我教育”——此文对爱默生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1]P215},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审美》(梭罗的名著《论公民不服从》就刊登在它的创刊号上)。

由于《日晷》杂志销量平平,而身为编辑的爱默生又务求版式新颖、装帧华美,导致成本上升。为了弥补亏空,1840年,皮博迪在自己的居所西街创办外文书店。该店的另一功能就是一座付费的流通图书馆:订阅者只需付五美元就可以借到欧洲大陆新近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很快的,皮博迪的外文书店不仅成为超验主义者的“信息交流处”(Transcendentalists' Exchange)^{[1]PX},同时也成为富勒等人举办“谈话”讲座,进行成人教育和妇女教育的场所。如果照当时著名作家霍尔姆斯的说法,“波士顿是宇宙的中心”^[5],皮博迪书店则堪称“波士顿(学术界的)中心”。

1842年,李普利牧师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创办布鲁克农庄。其全称为“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布鲁克农庄联合体”。农庄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到皮博迪“基督团契观念之一斑”(A Glimpse of Christ's Idea of Society, 1841)一文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小说家霍桑那样参加农庄的生产劳动,皮博迪却为农庄制定了详尽的条例和规划,并在《日晷》杂志上免费为之登载广告^{[6]P465}。她时常和爱默生、富勒等人一道造访,在农庄举办讲座,丰富农庄教育文化生活。

继最小的妹妹索菲亚与霍桑结婚后,妹妹玛丽也于1843年与当时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结婚。曼曾与皮博迪姐妹一同寄宿在克拉克夫人家中,他后来放弃上升的仕途,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秘书,投身到公立学校改革的运动中。作为他的挚友和知音,皮博迪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曼的主张“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7]获得了广泛认同。但他所主张的学校整齐划一的僵硬体制和管理模式,与皮博迪的理念格格不入。正如阿尔科特毕生为教育事业奋斗却始终无法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皮博迪也因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始终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体制(Uncommon learning for Common School)^{[8]PXXX}。

由于大量廉价书刊的进入,到1850年代初,外文书店

宣告倒闭。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除了写作和教学,皮博迪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制出一套用于历史教学的彩图,并在旅途中向经过的各地学校推荐。在此期间,她对德国儿童教育家福禄倍尔的理论 and 实践产生了浓厚兴趣。1860年她和玛丽在波士顿共同创办了全美第一所英语幼儿园,并出版了《幼儿道德文化导言》并获得成功。1867年她赴欧洲考察,并从福禄倍尔教学法中得到灵感。1870年她又创办了美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立学校。为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幼儿教育,除了撰写大量文章,她还担任了影响巨大的《幼儿园信使报》的主编(1873-1877)。1882年皮博迪应邀在老友阿尔科特创办的“康科德哲学学校”讲坛发表关于教育和文化的演讲,反响强烈。

到了晚年,虽然精力已不如从前,她还是与玛丽一道协助印第安萨拉公主举办旨在保护其传统文化的双语学校,并号召社会各界无私捐助,直到1887年玛丽因病去世。此后数年,皮博迪为疾病所困扰,无法自由行动,但仍然笔耕不辍,并撰写回忆录,直至1894年病魔夺走她的生命。

1830年代波士顿学校的状况基本沿袭殖民地时期的模式。教师以督责学生钻研书本为己任,学生则除了死记硬背,没有其他办法。用赫奇的话说,包括哈佛学院在内的众多学校,教员大多“一手执教鞭,一手捧书本”^{[2]P11},采用高压法进行灌输。皮博迪毕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努力探索出一条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新路。她的教育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欧洲先进教学理念以及身边亲友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她的母亲皮博迪夫人。她凭借“母性的直觉”,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悦的氛围,让儿童在娱乐中健康自然的成长。在她的课堂中,生动的对话,分角色朗读和创造性写作等方法交替使用,目的是“让学生们感到快乐……愉快地聚在一起分享知识并寻求帮助”^{[1]P82}。她和学生之间的谈话,不是居高临下地训斥和灌输,而是“为了提升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1]P82}。比如地理课上,她让学生假想身在遥远的国度给家人写信,介绍那里的状况。历史课上,阅读材料不仅包括新英格兰作家的历史纪实,也有斯塔尔夫及其他欧洲女作家的历史小说。她坚信无论从历史或现实来看,女性的智力都不亚于男性。她们理应享受同等教育。皮博迪后来说,“女性在文理最高教育方面不如男性的想法,我真的从未有过。”^{[1]P83}这是她从小亲身经历的感受。

与之相反,父亲的粗暴和威压却令她感到憎恨。父爱的缺失一方面导致她对儿童心理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另一方面也帮助她树立了自强自立信念,这也有助于她在日后与超越主义代表人物如爱默生、梭罗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探索中找到更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憎恶高压的威权的教育体制,主张天性的自然展开和心灵的自由发展。用她的话说,“教育的全部理论从根本上就错了”因为“灵魂遭到忽略”^{[1]P165}。

重视心灵的培养这一观念来自她的朋友和导师钱宁博士。钱宁在他雄辩的布道文“人神相似论”(Likeness to God, 1830)中并摒弃了加尔文原罪说,对人的天性给予正

面褒扬,甚至将其提升到与神平等的地位:“上帝的无限性在灵魂之中显现”^{[6]P24};而我们“唯有通过灵魂最高力量——包括理解力、良知、爱和道德意志——的自由与自然的展开,才能接近上帝。”^{[6]P25}此外,坚信宗教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人必先完善其自身道德,进而才可能改造社会,也是她与爱默生等人的共识。但与身为牧师的钱宁不同,她反对脱离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儿童道德教育。她的理想是像皮博迪夫人一样,营造出宽松、愉悦的氛围,并树立道德楷模(如耶稣),让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1860年代,全美各地幼儿园的出现,正是她这一理想的具体体现。

爱默生在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富于独创性的思想:每个儿童都孕育着天才,仿佛一粒胚胎,只要有适当的温度和土壤,让他们的天性自由发挥出来,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他将教育(Education)拆解成(E-ducation,向外的伸展、牵引),宣称教师的职责就是唤醒他们的灵魂,而“教育的秘密就在于尊重儿童”^[9]。他在演讲《论自然》中将儿童称为“永恒的弥赛亚”(The perpetual Messiah),视之为人类救赎的希望,这与皮博迪的看法完全一致。除了阅读写作和外出演讲,他将很大部分时间用于指导儿女的课外阅读,关注他们心灵的健康成长。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全部的学说就是相信人潜能的无限性”^[10]。他和皮博迪共同的朋友、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孩子是成年人的父亲”(Father to the Man)。与成人的经验世界相比,儿童更具天真的想象力和直觉的洞察力,这种创造力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人精神力量的源泉。

对皮博迪儿童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阿尔科特。他的儿童观,正如他的人生观一样富于理想主义色彩。他将钱宁的“人神相似论”进一步引申:成人被视为堕落之徒(Fallen man),儿童则被尊为半神(Demi-god),因为尚未受到成人世界的不良影响。他们是纯洁无瑕的个体,是真与善的化身,与上帝的本性最为接近。他反对洛克的“白板说”,认为儿童的心灵和大脑绝非白板一块,而早已具备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甚至只有儿童才有认识终极真理的直觉,只有儿童才能毫无困难地与上帝交流对话。教师面对学生,与其说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唤起他们对于知识的记忆,或激发其潜能。同时,他也相当注重道德楷模的作用。在神庙学校,学生座位的安排别出心裁,阿尔科特在中央,学生环绕在他四周,便于课堂回答和平等对话。书架上摆放着苏格拉底、莎士比亚等人的头像,目的是要学生“随时感受到他们的精神力量”^{[2]P53}。他在课堂教学中采用问答法,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通过反复诘问迫使学生不停地思考,从而找到各人自己的答案。他还要求学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每天反思自己的过失,通过内省和自我检束达到道德完美。

皮博迪对阿尔科特的教育理念大为钦佩,称之为教育天才,坚信“他可以开创一个教育史上的新时代”^{[11]P295}。但对于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她却有不同见解。首先,阿尔科特的问话方式虽然平易近人,但很多时候由于原理过于深奥,学生根本无法想象,也赶不上他思维的节奏。而阿尔科特一味

要求将学生引到抽象的原理上去,难免有“操纵谈话”愚弄学生之嫌。而皮博迪则崇尚心灵自由发展,反对给思维设限。其次,阿尔科特为了训练学生的耻辱感,时常设立圈套,诱使学生违犯纪律,而后当众责罚,同时对其他学生也产生警示和威慑作用。皮博迪认为这是卑劣无耻的行径,不仅无助于提升道德,而且毁坏了学校形象。此外,阿尔科特一味强调学生的道德内省,而忽视感官能力的培养。学生的体育课被取消,游戏活动也被禁止,整天埋首于书本。皮博迪坚持认为“儿童的感官教育背后自然是灵魂最高官能的训练与提升”^{[11]P108},对外感觉印象既被切断,内心道德观念也很难改进。她本人坚决提倡更多的游戏、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最后,阿尔科特的学说认为儿童似乎是在“神意”(Divine Truth)的包围中成长,无需借助于历史知识和文化传承,仅凭其直觉就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皮博迪认为这样的看法较为天真片面,她反对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更强调文化传承及家庭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最终促使皮博迪做出离开“神庙学校”决定,因为她发现阿尔科特夫妇私拆了她与妹妹玛丽的通信。个人隐私遭到侵犯,人格受到侮辱,皮博迪愤而离去。在她看来,私拆信函的罪恶远过于和儿童讨论性问题。随着她的离去,“神庙学校”也很快倒闭。

1850年代以后,皮博迪受到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的影响,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游戏和活动,塑造他们的道德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发展他们的智力体力和生产实践的能力。1860-1870年代创办幼儿园及培训幼儿教师等实践,也大大丰富了她的教学思想。

在她漫长的一生中,皮博迪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儿童教育事业。与儿童共同成长也成为她终生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奥秘。值得一提的是,有感于当时(1830年代)儿童读物的匮乏,她曾写信给华兹华斯,请求诗人撰写一部适宜的儿童读本。虽然诗人婉拒了他的请求,但她的执著与热忱却给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了共鸣。因为她“反对对成人的思维强加于儿童”^{[11]P326},与浪漫派讴歌儿童纯朴天性、针砭成人世界虚伪丑恶的观点一脉相承。

皮博迪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她对儿童天性及心理的认识和把握。自1820年代开始执教,直至1860年代创建第一所幼儿园,经过长达40余年的探索,她终于发现:慈爱、耐心的教师,宽松、愉悦的环境,音乐、绘画和雕塑,还有体育活动以及游戏,就构成了早期儿童教育的全部内容。

作为曾经的超越主义者,皮博迪始终坚信个人的精神力量至大至刚,无远弗届,即使在儿童身上也不例外。她在演讲中曾说,“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出被囚禁的精神”^{[11]P111}。精神可以认识人自身,可以调和人的感觉经验和道德直觉,可以让儿童逐步树立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福禄贝尔一样,皮博迪极其重视儿童感官能力的培养,挂件、插图、用于数数的干豆,都成为儿童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相反,像阿尔科特那样将学生禁锢在监牢一般的教室,则可能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窒息其灵魂。

体育锻炼或游戏的功能绝不仅仅限于强身健体。被困

禁的灵魂是痛苦的，而运动或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它释放出来。阿尔科特相信儿童在出生时充满了神性，随着慢慢长大，神意或神知就渐渐离他远去。而皮博迪断定所有的知识和自我意识都要首先经过身体，只有身体获得解放与自由，灵魂的力量才能进一步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皮博迪也清醒地意识到运动和游戏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虽然钱宁认为儿童具有天然的“向善性”，洛克的经验论却告诉她儿童同时具备为善和为恶的潜能，他们并不天然就了解“上帝赖以创造宇宙万物的法则”^{[1][P111]}，而需要通过教育引导加以实现。在她看来，道德教育尤其是宗教道德教育，与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承的教育至少应该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文化教育方面皮博迪最为重视的是历史。儿童应该首先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只有完整的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她为儿童精心选择历史读物，让他们了解耶稣、苏格拉底、以及中国孔子的生平事迹。阿尔科特强调学生的内省和反思，却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皮博迪认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生动故事，可以在儿童脑海里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在这一点上，她同意爱默生的观点：历史不是枯燥无味的事实和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正如爱默生在题为《历史》的演讲中所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1870年代以后，尤其当皮博迪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全美各地普及和推广幼儿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就成了她工作的最主要内容。而其中最迫切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幼儿教师范学校，培养师资力量，正如贺拉斯·曼在致力于公立学校改革之际，竭力强调建立和完善师范学校一样。她坚持认为，青年女性担任幼儿园的老师更为合适。女性在智力发展方面天然不逊于男性，这是她早年家庭教育所得出的结论；同时女性更具“母性的智慧”和耐心，相对于粗暴地责骂和棍棒的威胁，和风细雨式的熏陶与教化更容易深入儿童幼小的心灵。

另外，与她的个人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是她本人对于美育重要性的理解。她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索菲亚都具有艺术天赋，在钢琴、绘画和雕刻方面有相当造诣。而她们的成就早在幼年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阿尔科特主张教育由思考入手，皮博迪则赞同福禄贝尔的观点，认为教育始于行动。而行动的结果便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爱默生在《论自然》中将行动与自然、书本视为人类知识的三大来源。而皮博迪也深信行动所造就的艺术品对于儿童教育而言，其成效远胜于抽象的反省。正如比克曼教授指出的，“将思想与行动融合为有机的整体”^{[8][PXXX]}，不仅是皮博迪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是超验主义教育观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了儿童教育思想，皮博迪关于自我教化以及终身教

育的思想也值得重视。她本人是自学成才的典范，精通数门外国语，文史哲方面知识也堪称渊博。她虽然没有资格进入哈佛学院攻读学位，但哈佛校长柯克兰却宣称“她在文史方面的造诣要超过任何一个哈佛学院的毕业生”^{[1][P21]}。她日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正是自我教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结出的硕果。此外，皮博迪还倡导终身学习，认为“人的一生就是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1][P216]}。对她而言，正如20世纪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完结的产品，而是一个过程。事实上，考虑到在她八旬高龄，仍孜孜不倦，帮助印第安人建立双语学校，保存其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说她的一生，就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辉煌历程。

1894年，即皮博迪去世的这一年，年轻的哲学家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教育系。他还和夫人一道创办了一所实验中学。从场景布置手工设计到活动安排，都与皮博迪当初理想的学校相契合。杜威提出的原则是“从做中学”，几乎是皮博迪主张的“行动胜于反思”学说的翻版。她与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等人共同倡导的新型教育理念，重在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反对违背儿童天性的强制灌输，是美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重温这一思想，或许可以为当下如何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 [1] Megan Marshall, *The Peabody Sister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 [2] Martin Bickman, *Minding American Education: Reclaiming the tradition of active learning*,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3.
- [3] John Matterson, *Eden's Outcast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7: 56.
- [4] Barbara L. Packer,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7: 57.
- [5] Philip F. Gura,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246.
- [6] Perry Miller, *The Transcendentalis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7] Joel Spring, *The American School 1642-1990*, New York: Longman, 1990: 93.
- [8] Martin Bickman, ed., *Uncommon Learning: Thoreau on Educa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 [9] Howard Mumford Jones, ed., *Emerson on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59: 141.
- [10] Merton M. Sealts, Jr., *Emerson on the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2: 188.
- [11] Bruce A. Ronda, "Elizabeth Palmer Peabody's Views of the Child", *ESQ* V23, 2nd Quarter, 1977.